

试论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文化脉络

张允熠¹, 郑文娟²

(1.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上海 200234;
2. 上海师范大学 哲学与法政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脉络中含有马、中、西三种文化血脉,其中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西方文化的优秀元素融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血脉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三次飞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深扎根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发挥着灵魂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根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通过传承、融入中国传统哲学。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方面直接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另一方面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间接地吸纳了包含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之内的西方优秀文化的精华。中国马克思主义是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其主体性地位是在文化自信的理念支撑下确立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体用贯通”和“明体达用”,这表明当代中国文化仍然是有体有用的。用“魂、体、用”来阐明马、中、西三者之间关系的方法仍然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文化主体性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5.01.003

本文所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特指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它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整体与部分、总体与个体之间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后生、派生体系,实指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其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两个结合”后的思想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扎根和发展的标志性成果,它也是中西文化之间长期会通与融合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最高理论形态。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机体脉络中含有马、中、西三种文化血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其中马克思主义为“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西方文化的优秀元素被吸收并融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血脉之中,这是需要正视和澄明的事实。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正是在中西多元文化的交流互鉴中被彰显出来。

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魂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两个结合”,中国马克思主义实为“两个结合”的产物。这种既与

作者简介:张允熠,哲学博士,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郑文娟,上海师范大学哲学与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同原典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什么关系呢?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吗?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就有人提出过这一问题,而今又有人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科学社会主义吗”同类的问题。由于有了“中国化”或“中国特色”这些外延词,人们提出上述问题可以被理解。

第一,从逻辑上来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种属种关系,马克思主义是属,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种。反之,则是种属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是种,马克思主义是属,两者是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中国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包含与被包含且属性一致的关系,而不是彼此对立或属性相悖的关系。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也是如此。

第二,从学理上看,中国马克思主义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是个别与一般、特殊与普遍的辩证关系。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个别是存在、感性、具体、个性、特殊。与之相对应的一般是思维、理性、概念、共性、普遍。一般与个别的关系是思维与存在关系的一种抽象和辩证的表达式。换言之,存在与思维、感性和理性、实践和认识、具体与抽象、殊相与共相、特殊与普遍、物质和精神等对立范畴,皆可转型为个别与一般范式加以表述。思辨哲学(如黑格尔的哲学)认为,一般高于个别,一般第一性,个别第二性,个别寓于一般之中。与此相反,唯物辩证法则认为,个别高于一般,个别第一性,一般第二性,一般寓于个别之中。根据这一辩证法则,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就寓于中国马克思主义这一个别之中,两者在本质上不仅不相悖,而且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中国马克思主义才能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挥出伟大的社会变革作用。

第三,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状况来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主要体现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之中,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在理论上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在实践中用它来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进程。在中国具体的历史和现实情势下,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必然开显为“两个结合”,这种结合在中国革命实践中形成了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里程碑,它指引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进而指导在中国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经过三十年的曲折历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第二次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第二次飞跃形成的新成果,党的十七大报告对这一理论体系的内涵作了准确的界定: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呈现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新的飞跃——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飞跃。

三次飞跃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深深扎根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中发挥着灵魂作用。“中国化”“中国式”“中国特色”这些关键词,其深刻含义就在于它标明了马克思主义正在东方大地上获得新的活力和新的发展。晚年恩格斯曾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1]他强调理论要符合实际,“我们对未来非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现代社会的特征的看法,是从历史事实和发展过程中得出的确切结论;不结合这些事实和过程去加以阐明,就没有任何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2]每个国家都有其

具体的国情,“至于这些国家要经过哪些社会和政治发展阶段才能同样达到社会主义的组织,我认为我们今天只能作一些相当空泛的假设。”^[3]马克思也说过:“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但是,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4]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话表明他们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必须同各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不能将其固化为不变的教条。列宁把这种“对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方法称之为“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和“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5]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矛盾论》中两次引用了列宁的这句名言,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赓续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

马克思主义为灵魂,中国就是秉赋这一魂脉的魁梧健壮的身躯。同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个理性范畴又是个实践范畴,它不仅保留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的魂脉,而且蕴含着适合中国道路的直接现实性品格——中国式现代化彰显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根脉”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其理论本质上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哲学优秀成分相融合的产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民族的生命本根,预示任何外来文化离开这一本根都无法成活。马克思主义原为外来文化,如果它脱离了中国文化的本根,就只能是一种游魂,形成不了“魂脉”。“魂脉”需要“根脉”的支撑。“根”是生命本源,“脉”是营卫血气的主经络,中国马克思主义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其根脉,从几个维度或路径中表现出来:

第一,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华民族之所以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就在于有一个博大精深、历久弥新的具有独特价值的优秀文化体系。中国历史上曾遭受外敌入侵,也经历民族劫难,但总能起死回生,屡挫屡兴。侵略者被驱逐,征服者被征服,靠的是强大的民族文化和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秉持中国马克思主义信念的中国共产党人是现代中华民族最优秀的群体,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那天起,就把赓续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神圣使命。正如毛泽东所说,今天的中国是过去中国的延续,中国马克思主义不仅不会忘记历史,而且对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两千多年的中国思想文化给予了批判总结,承继这一珍贵的历史遗产,加以发扬光大。这是从建党伊始直至今日一直持之不渝的初心使命。在实践这一使命的历程中,中国丰厚的历史遗产和精神价值得到了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内核得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这方面最杰出的案例或代表作就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所撰写的原创性著作,如“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等等。毛泽东的这些哲学著作的特点就是以中国优秀传统哲学为根基,脉连马克思主义之魂,使“魂脉”与“根脉”统一、传统与现代贯通,突显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

第二,从义理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同中国哲学在义理深处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此种亲和力构成了两者意义和论理之间的共同逻辑起点。中国传统哲学偏重“意象思维”,着眼于有形、有象的现存世界,如《易·系辞》说:“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象”指具体物象——“象也者,像也。”“立象以尽意”是指“象”所指向的具体物象一旦确定,意义即可澄明;“卦”在本质上也指具体事物,“八卦”就是八种自然物象,立“卦”的目的在于彻底察明客体的真或假(“情伪”)是否确切,依此可加以利用。《易经》主张“利有攸往”,《尚书·大禹谟》强调“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利用”与“厚生”可以视为“立象”和“设卦”的真正用途和目的。相较《周易》哲学的“意象思维”,马克思主义哲学更重视理论思维,但这种理论思维必须建立在事实根据之上,而不能像欧洲传统形而上学那样以虚幻的、

抽象的神学观念作为思维的逻辑起点,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本体论同中国哲学产生了共鸣。本质就是现象,现象反映本质,现象可以意会也可以理喻;哲学不仅用来“解释世界”,更重要的在于“改变世界”,“改变世界”在义理上同中国传统哲学的“利用”“厚生”之间具有某种内在亲和力。

第三,从思维路径上来看,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法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之间不存在任何思维障碍,两者具有路径上的相通之处。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是对黑格尔概念辩证法的改造升级版,其中包含着对立统一、质量互变、否定之否定三大规律,而蕴含这三大规律的思维逻辑在中国哲学中都能找到其雏形。如《易·系辞上》的“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就是指“对立统一”是宇宙间客观存在着的一种最普遍的自然法则(“道”),只不过“百姓日用而不知”而已;再如《易·坤卦》中的“履霜坚冰至”,意含从自然界最细微的变化中就能体察出“积渐成著”的哲学道理,这已经触及从量变到质变和质量互变的辩证规律;再如《老子·第四十章》中有“反者道之动”一语,这里就蕴含着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以及事物在对立面之间相互转化的规律。其实,质与量、肯定与否定,都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老子·第四十二章》中还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一句,意指世界万物都是阴阳二气的对立统一结构,阴阳两种势力既斗争又同一,是自然和社会中最基本的运行规律,此与马克思主义的矛盾双方相辅相成的辩证法不谋而合。毛泽东的《矛盾论》明显地继承了中国哲学“一阴一阳之谓道”辩证法传统,同时又贯通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矛盾学说,并把两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第四,从实践维度来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哲学都重视人类的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两者关系的统一,统一性的具体开显路径就是实践。“实践第一”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基本的观点,“疾虚求实”“知行合一”是自孔子创立儒学之后直到明清及近代最为长久的学术思潮。虽然以道德实践为主的中国哲学的“实践”观与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近代工业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具有不同性质和时代落差,但在其逻辑起点和思想行迹上具有契合性。正是出于此种原因,中国近代民族精英从儒家的“实学”基点弹跳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论域没有任何心理障碍,毛泽东的《实践论》就充分体现了这一心路历程。《实践论》是20世纪中国哲学最具原创性的哲学著作之一,它不仅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引入了“实践第一”的理念,而且还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知行”学说与“实事求是”的精神有机地融通起来,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的“知行统一”观,并以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把中国文化的“根脉”和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化合成一体的光辉范例。

第五,从社会维度上来看,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都有关于“共同体”的论述。中国古代儒家虽然没有使用“共同体”这个概念,但是《礼记·礼运》借孔子之口所讲的“小康”与“大同”就是两种共同体形式。“小康”为国家共同体,在这种共同体中,“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大道”是一种理想社会形态,这种理想社会形态在国家共同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国家为阶级社会,国家政权为一姓一家所据有,人与人之间“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人们自私自利,权力世袭,礼制分等,“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修建城郭沟池加固防卫,用礼义制度规范群臣百姓……即便如此,仍然“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勾心斗角之事频繁发生,兵戎相见之事随时而起,这是国家的惯常状态。只有在这种共同体中,方能显示出禹、汤、文、武、成王、周公这些杰出人物的治世之能。孔子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共同体(理想社会形态),真正的共同体应该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共同体中,“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社会实行全面保险,弱势群体受到保护,男女享受各自权利,每个人“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无阶级、无剥削、无国家、无战争,人民安居乐业、相亲相

爱、高度道德化,这种共同体就叫“大同”。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国家”也是一种“虚假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文化的“根脉”中,人们找到了通往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之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具有高度契合性。”^[6]这段论述采用了中国古代典籍中的成语,语意深刻,言简意赅。参照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相关思想资料深度解读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高度契合性”,揭示两者互相结合的思想前提及其内涵,目前已有一批专著和专文论述,在此不再赘述。^[7]

有必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化。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先进理念改造、更新和转换传统哲学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的一项重要任务,而中国传统哲学的现代追寻也是中国本位文化实行创造性转换的内在需求。现代与传统的结合、“魂脉”与“根脉”的结合,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就决定,我们决不能抛弃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决不能抛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8]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这一著名论断之前,方克立先生曾提出“马魂中体西用”的三分法,方克立先生的界定与习近平总书记的提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的“魂脉”与“根脉”的比喻有一个前提,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个重大命题本身”,显然,他说的“魂脉”与“根脉”仅指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魂脉”与“根脉”,而方克立先生指的是中国新文化的“魂、体、用”,其中的“魂”不仅是经典马克思主义,也包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自身。

三、中国马克思主义血脉融入了西方文化精华

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向西方学习的历史。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回顾了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指出先进的中国人为救亡图存,经过千辛万苦,努力向西方国家寻求真理,被迫从帝国主义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存中搬来了各种学说和政治方案,但都相继失败了。自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中国人才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从此中国历史改变了方向,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了。

毛泽东的论述中折射着一段曲折真实的叙事,那就是百年来中国人历尽了“西天取经”般的艰辛即努力向西方学习的文化心路,才终于取来了马克思主义这部真经。换言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落地生根正是在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碰撞、交流融合的深度场景中实现的。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中国人不仅向往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工业理性和技术,而且也热衷于西方近代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自由平等博爱”观念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近代西方的社会政治理论学说,马克思主义自身也是被视为“西学”中的一分子为中国人初识的。另外,“五四”时期在中国思想界掀起过一场译介和传播西方近现代哲学的热潮,这一热潮激发和促进了中国民族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交流、互鉴和融合。当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人眼里等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作为“社会主义之泰斗”被追崇。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和中国知识界对西方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相继被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掌握,至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的全部理论体系在中国的传播基本完成,这是一个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近代西方资产阶级

学说的先进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思想体系。

马克思主义直接生长于西方文化思想的土壤之中,西方思想文化中所包含的优秀成分积淀成为其丰厚的精神资源和思想营养,其本身就体现了西方文化最先进的思想成果。延宕两千多年的西方文化有着几大传统,即“犹太—基督教”的宗教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传统、理性主义(从古希腊到近代德国)的哲学和科学传统。^[9]对于这些传统,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扬弃而非抛弃的做法。如,对待基督教的神学信仰传统,马克思主义把它从天国还原到了人间;对于形而上学传统,马克思主义砸碎其思辨哲学的外壳而取其合理内核;对于近代人文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用“人的本质”取代了其抽象的人性论;对于19世纪新兴的自然科学,马克思充分吸收其研究成果作为思想资料用来充实和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等等。欧洲文化的几大主流传统是孕育马克思主义的直接思想文化土壤,马克思主义不但没有脱离欧洲的文明大道,而且以其精深的思想内涵超越了西方文化传统。

马克思对西方哲学体系最成功的扬弃就是改造了西方的本体论。本体论(ontology)原是19世纪在德国出现的名词,该名词反映了源自古希腊的形而上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近代西方哲学的共同本质特征。“本体”本是一个中国哲学范畴,意指事物的本质、本源和根源,譬如“道”或“理”。在中国哲学中,无论这一概念如何抽象,但总是能被人经验或体验的。西方的ontology则不同,尽管它也有本质、本源的含义,但在传统形而上学和神哲学中,它仅仅存在于思维世界之中,是不可经验和体验的。譬如经院哲学的“神”“灵魂”或“逻格斯”以及黑格尔的“绝对理念”和“绝对精神”,等等,只能通过思维去把握。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早已指出,ontology不应译成“本体论”,而应译成“是论”或“存在论”。中国的“本体论”在西方被理解为物本论或泛物论,西方的“本体论”正如德里达所称谓的那样,叫作“逻格斯中心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扬弃了欧洲思想文化传统中的“逻格斯中心主义”,马克思认为“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10]马克思的这一认识无疑把本体论还原到了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等唯物主义哲学家那里去了,而且更加接近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不过,无论是希腊古代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其唯物主义都是素朴的唯物论,俗称“旧唯物主义”,而马克思称他的哲学为“新唯物论”,这无疑超越了西方传统的“是论”。马克思的新唯物论不仅重塑了物本论的宇宙观,其最大的贡献就是其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拓展,即历史唯物论的生成。历史唯物论构建了一个科学的关于人类社会的崭新的思想体系,即以人为中心的本体论。正是现实的人、每个实践着的个人,形成了人类社会在客观物质生产活动中呈现出来的历史动力。人论、历史必然性、动力论、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及对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社会规律的探索,构成了马克思历史哲学的总体性。

马克思在吸收了西方哲学中的基本内核与合理内核之后完成了近代历史上一次伟大思想文化领域中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抹不掉西方近代哲学的文化底色和时代背景,西方近代哲学在遥契古希腊哲学和吸收东方哲学的基础上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提供了坚实的思想资料,从朴素唯物的“本体论”(希腊和中国都有)到“逻格斯中心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成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从柏拉图的“理念”到亚里士多德的“是”之为“是”(Being as Being),再到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这是另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心路,后者是黑格尔哲学的心路。正如克尔凯郭尔批评黑格尔时所说的那样:“大多数体系制造者对于他们所建立的体系的关系宛如一个人营造了巨大的宫殿,自己却侧身在旁边的一间小仓房里:他们并不居住在自己营造的系统结构里面。”^[11]黑格尔哲学是柏拉图哲学的近代升级版,马克思让它头足倒置的体系重新颠倒过来,这就是西方哲学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演进图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扬弃西方形而上学方面被公认的成就是提出了“思维与存在”的范式,在传承了西方传统的“是论”或“存在论”的同时并没有抛弃黑格尔哲学中的精华——辩证法。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有三个要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费希特的自我意识以及前两个要素在黑格尔那里的必然充满矛盾的统一,即绝对精神。第一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人分离的自然。第二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同自然分离的精神。第三个要素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以上两个要素的统一,即现实的人和现实的人类。”^[12]这种具有穿透力的深邃的观察和思考,让马克思公开承认他是黑格尔“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13]他同时又指出:“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14]马克思的这种表态,无疑承认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含有黑格尔哲学的血统,黑格尔哲学的血统中又含有从古希腊哲学到欧洲近代哲学中的本质主义。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合理内核”如此,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也是如此。还有英法两国的社会主义学说和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无疑内在地包含西方文化中一切优秀元素。诚如恩格斯所言:“共产主义建立在健全的哲学原理的基础上,并且是——尤其是——从德国本国哲学必然得出的结论”;^[15]“我们不仅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且继承了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16]由于欧洲近代思想文化即马克思主义产生的思想文化土壤中也有16—18世纪“中学西传”即中国传统哲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在批判继承欧洲近代哲学时也直接或间接吸收了中国优秀文化的元素。

列宁曾说:“共产主义是从人类知识的总和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主义就是这方面的典范。”^[17]列宁还指出,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按照这个方向,才能认为是发展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列宁的这些话可以表明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统和主脉。在列宁之前,普列汉诺夫就已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的基础早在古希腊就由德谟克利特奠定了。”^[18]既然马克思主义吸收了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文化中的一切有价值的元素,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在百年来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一方面直接吸收了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另一方面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间接地吸纳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内的西方优秀文化的精华。

四、文明互鉴与文化主体性

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的几个主脉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其中的“魂脉”与“根脉”又像人体中的任督二脉,维系着全身的血液循环。然而,无论“魂脉”与“根脉”,都离不开人类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交流互鉴与相互成就。中国马克思主义在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历史背景下产生,而其主体性地位是在文化自信理念的支撑下确立的。

文化的交流互鉴是存在于不同文化间的一种自然历史进程,也是整合全人类不同民族和不同文明所创造的共同价值的有效机制。一个优秀民族的优秀文化绝不可能孤立发展,近代欧洲主流民族如果不是于公元5世纪接受了“希伯来—基督教”文明,它们仍然处在野蛮状态;如果不是于公元13世纪从阿拉伯世界发现和引进了古希腊文明,欧洲社会就不可能有文艺复兴;如果不是把“两希(希伯来、希腊)”理念相融合,也不可能有近代欧洲文明;如果不是从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中吸收了理性主义思想,欧洲启蒙运动和近代欧洲哲学的形成就会成为问题。反观中国也是如此,如果不是吸收了印度传来的佛学思想,就不可能有宋代新儒学的产生。自汉唐以来,中国思想界就为“儒释道”三大流派所支撑,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骨脉和血脉。不断地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作为思想养料,最后化为新鲜的文化血液,融合为自己文化躯体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正是民族文化主体性日益强大

的表现。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华文明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19]文化的包容性正是文化主体性的体现和文化自信的基石。

一部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任何伟大的文化系统都离不开对其他文化系统的开放、借鉴和包容。西方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接续了古罗马、古希腊文明，而且吸收了阿拉伯和中东各民族所创造的文化，在16世纪后还历史性地接触了来自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就在罗马教廷试图把中国变成基督教国家的同时，中国的儒家经典也被引入欧洲各主要国家，其在欧洲的流行促成了长达近两个世纪的“中国热”和“中国学”（Sinology）的研究，成为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兴起和欧洲近代哲学产生的催化剂。这一时期欧洲顶尖级的学者，从培根到洛克，从孟德斯鸠到伏尔泰，从莱布尼茨到康德，等等，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在其著作中提到中国，言辞上虽有褒有贬，但其思想或多或少都受到过中国影响。

莱布尼茨与《易经》哲学的关系至今仍是一个令人着迷的学术话题，莱布尼茨对中国哲学和文化有着高度认同，他在评价《中国哲学家孔子》时说：“这部著作并非由孔子亲手著成，而是由他的弟子将其言论加以收集、编辑而成。这位哲学家超越了我们所知道的几乎全部希腊哲学家的时代，他总有着熠熠闪光的思想和格言。”^[20]由于莱布尼茨推崇朱熹哲学，朱熹的“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潜移默化地出现在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哲学理念之中。马克思主义正是孕育在从莱布尼茨到康德和黑格尔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思想胚基之中，马克思一生都尊崇莱布尼茨，这也是耐人寻味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曾暗示，中国哲学是由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经马克思主义一番科学化后而生成了“新唯物主义”，这即是说，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生过程中吸收了中国哲学。我们不排除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地研究过中国哲学，但是中国哲学原理是他们主要通过欧洲近代思想文化作为媒介被间接吸收的。^[21]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也是不同文化系统之间交流互鉴的思想成就。中国人之所以义无反顾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一方面出于近代积贫积弱的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的需求，另一方面在众多的外来思想文化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之间最具亲和力。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即在“两个结合”中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这有其历史和思想文化的内在必然性。

其实，西方文化也有一个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分通过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进而化合为中国现代新文化血脉中的有机成分，成为被中国主体文化所吸收的营养物质。但是作为文化主体，在同西方文化相交相处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具有不可动摇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2]没有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就谈不上不同文化系统间的交流互鉴，更谈不上吸收外来文化为我所用。

何为“文化主体性”？所谓文化主体性实指由文化主体所展现出的一种本质属性，如，中国文化的主体性首先就是中国性，亦即民族性。当然也包括个体性、生命性（生存性）、功能性、价值性、时代性、历史性、空间性等等。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就是强调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处在世界文化森林中，主体是中国，主体在我。可见，文化主体是相对于文化客体而言的，文化客体则是独立于文化主体之外的“他者”。文化主体与客体之间是“己方”与“彼方”的关系，在己（我）为主体，在彼则为客体；相反，在彼为主体，在己（我）则为客体。此为一种互为主体与互为客体的关系，如借用胡塞尔的术语，可用“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来表述。总之，主体性是由非主体性即“他性”规定的。离开了其他文化系统的存在，离开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互鉴，就没有文化主体性可言。因此，文化主体性是攸关文化生命的头等大事，不可不澄明，不可不重视。这意味着在多元文化的格局下，不可迷失文化的自

我。文化自我要在同文化非我的互动中达到文化自觉,进而找到文化自信。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良性互动互鉴,一方面表现为互相包容,另一方面实现互相成就。包容就是包容彼方的某些异质性,成就就是成就各自的主体性。己方如果不具备文化自觉,就可能逐渐被彼方所同化;一味认同和推崇彼方的一切,甚至主张“全盘西化”,这种双膝下跪的文化互动就会使文化主体性荡然无存。民族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正是如此。

文化主体性既然是文化主体所呈现出的本质属性,其属性必然在主体的结构功能中呈现出来,即有什么样的结构就有什么样的功能。为了澄明这一状态,方克立先生曾使用了四个中国经典古语——“自强不息、变化日新、厚德载物、有容乃大”,^[23]把中国文化主体概括为“生命主体”“运作主体”“创造主体”“接受主体”四个层面,以此揭示民族文化主体性结构功能的内涵。这里,我们参照并吸收方先生的提法重新作五个层面的概括:

第一,生命主体。指既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又经过近现代变革和转型的中华文化的生命总成,是文化主体的有机结构的基础性躯体,其余的主体功能都离不开生命主体。中华文化主体首先是生生不息、发展、繁衍、壮大不已的文化有机体,它活力四射,永不凋零,是民族生命力的彰显。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上传承五千年而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意指中华文明生命力的强大。这种强大的生命力不仅使它傲然挺立于世界文化之林,还在于它不断焕发着青春活力,历久而弥新。

第二,创造主体。生命主体在于创造,创造必然导致文化生命的更新,所以,创造即是创新。儒家经典《易经·杂卦》中有“革故鼎新”一词(“革,去故也;鼎,取新也”),《易经·大畜》中又有“日新其德”的成语,《礼记·大学》中还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一语,其内涵都是强调文化生命的创新功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重要内容,文化的创造主体也就是文化的自信主体。“文化自信”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中的核心关键词,文化自信支撑文化创造,文化创造巩固文化自信,两者是相辅相成关系。

第三,吸收主体。创造主体在于创新,新质文化不断增强文化的生命主体,吸收不同文化系统即外来文化中的优质元素,是文化生命总体增益新鲜血液的必要途径。我们强调中华文化的主体性,但从不盲目排外,“厚德载物”“有容乃大”体现了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主体精神和宽阔胸襟。中华文化在古代吸收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中亚的波斯文化、希腊化的犍陀罗文化在中国也有流传,近代又广泛吸收了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和科技文化。马克思主义本来也是作为西方优质文化的一分子,面向未来我们仍然要不断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质和新质文化,目的在于增强文化主体性,丰富和建设中华民族的现代新文化。

第四,传播主体。传播主体是文化主体性的对外体现。中华文化在“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24]的同时,还要面向世界,改变世界。中华文化在古代曾经引领东亚文化的主流,文艺复兴后传入欧洲,推动了欧洲的思想启蒙运动,而今在世界多极化、文化多样化、科技智能化的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一方面为世界文化的多样化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向世界塑造当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正面形象,让世界倾听中国人热爱和平的声音,领略中华文明的丰采,以更加开阔的全球视野和现代眼光推动世界各国优秀文化的相互学习与借鉴,加强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为中国式现代化服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挥中华文化的“和为贵”的合作共赢的功能。

第五,叙事主体。在传播中国声音的同时,还要叙述好中国故事。叙事主体即中国主体,叙事方式即中国方式,叙事话语即中国话语。要改变旧有的思维惯性、讲述方式和话语体系,要打破国际话语平台被“彼方”(西方)操控的旧格局,既要掌握国际话语权和话语高地,还要让中国叙事为世界所

接受。叙事主体是文化主体性重要的表现形态,这就要求在世界舞台上能够展现文化主体性的中国式话语体系和基本概念、理念和范式,这种概念、理念和范式必须要在坚实的学术群体和学理逻辑的支撑下运作。须知兹事体大,这是国家智能的体现,也是国家软实力的彰显。

文化主体分开来讲是五个,合起来讲就一个:文化中国或中国文化主体。文化的主体性即文化的总体性,它涵盖了当代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本根(根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本来就含有的西方文化的优质成分,共同结织成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脉络,是中国新文化建设的底层逻辑和基本架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脉络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当代中国主流文化具有一脉相承的性质,它既是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本根,又是中国新文化的本体、实体,其所吸收的西方优质文化发挥着滋补中国新文化机体的营血作用。有人反对以“体用”范畴作为论述中西文化关系的说理工具,但习近平文化思想特别强调“体用贯通”和“明体达用”,这表明当代中国文化仍然是有体有用的。方克立先生曾用“魂、体、用”来阐明马、中、西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一方法在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时,仍然有借鉴意义。

注释:

[1][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88、582、54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30页。

[5]《列宁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13页。

[6]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7]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还有许多契合处和共通处,可参见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张允熠:《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异同论》,《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0年第4期;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哲学的互动与融通》,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张允熠:《解读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7期;等等。

[8]《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不断深化对党的理论创新的规律性认识 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取得更为丰硕的理论创新成果》,《人民日报》2023年7月2日。

[9]参见张允熠:《四百年中国思想文化之大变局:中国化视域下“中西马”哲学的互动与融通》第四章第一节,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年,第511-526页。

[10][13][1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22、22页。

[11][丹]彼得·P.罗德编:《克尔凯郭尔日记选》,姚蓓琴、晏可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30页。

[1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1-342页。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9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587页。

[17]《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33页。

[18][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页。

[19][2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4、8页。

[20]吴孟雪:《柏应理和〈中国哲学家孔子〉》,《中国文化研究》1996年第3期。

[21]参见张允熠:《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第十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

[23]方克立等:《马魂 中体 西用——中国文化发展的现实道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页。

[24]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6页。

[责任编辑:马立钊]